

# 沙龙—利库德—右?

## 利库德与工党,谁左?谁右?

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,利库德是右翼、右派,工党是左翼、左派,宗教的沙斯党则是极端右派。多么明确的政治界线!我想,最好不要用我们的政治理念去套以色列的政党:一左全左,一右全右,左比右好。只要说,利库德是民族主义的政党,工党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就够了,因为在不同领域,对待不同问题,工党不总是左,利库德未必都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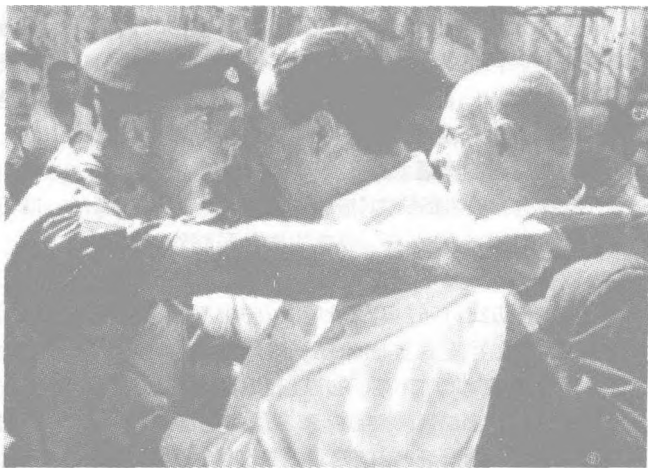
说利库德右,可能是指它对占领区的政策,特别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硬态度。其实,人们早有共识:“以色列两大党在上述问题上的目标没多大分歧,只是在具体策略和方式上有些不同而已。当年贝京在归还西奈半岛时,工党主张至少保留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半岛的东海岸,以确保以色列船只自由出入红海。拉宾至死也不同意放弃西奈的某些要地,如北部的亚米特。谁左?谁右?”

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,工党领导人的态度可归结为三种:达扬主张“开放的桥梁”,不公开宣布兼并西岸,而在“和平共处”中实现事实上的兼并;总书记加利则主张犹太人在西岸自由定居,通过定居,公开兼并西岸;副总理阿隆主张不全部兼并西岸,而与约旦共同瓜分。这些主张与利库德的主张差别究竟有多大?1998年两党在西岸的差别具体地表现为:“美国向内塔尼亚胡提出第二阶段撤军的幅度是13.1%,工党表示同意,内氏说“不”,只同意9%。工党与利库德两者仅4.1%之差。

对待巴勒斯坦人民又怎样呢?1987年底巴勒斯坦人民举行“扔石头起义”,当时工党国防部长,后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(拉宾)采取“铁拳政策”,于是有1775名扔石头的巴勒斯坦人被铁拳“敲碎了骨头”;1996年另一位和平奖得主(佩雷斯)为“造势”与内塔尼亚胡竞选总理,发动了“愤怒的葡萄行动”,这是自1982年黎巴嫩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,并炮击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营地。甜美的“葡萄”——“愤怒”,使200多名黎巴嫩平民倒下了。巴拉克更是毫不逊色,动用了飞机、导弹、坦克对付“阿克萨起义”的巴勒斯坦人,400多名巴勒斯坦人

丧生。对此,看不出工党与利库德究竟有多大差别。

工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正统派,天下是他们打下的,理所当然地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,垄断了社会上几乎所有体面的职业,工党实际上是以色列既得利益集团——西方犹太人的代表。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东方犹太人,他们生活在开发城镇的贫民区中,实际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犹太人。他们要求打破西方犹太人的垄断,要求进行权利再分配。利库德正是他们



较量

的政治代表,它主张市场经济、自由贸易、公平竞争、鼓励私有企业。1977年,正是在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下,利库德取得政权。利库德、工党,谁左?谁右?

在国际舞台上,工党更多地跟着超级大国的指挥棒转,而利库德还敢于小声地说“NO”。我们不会忘记:中国和以色列是在利库德执政时期顺利建交的。为中以建交,利库德的四大元老来了两位:阿伦斯和利维。中国向以色列订购预警飞机起于利库德,而止于工党。那位脸上经常堆起微笑的巴拉克,几个月前还信誓旦旦,但在指挥棒下,他不顾国际惯例,不惜败坏中以关系,撕毁协议,因为在他心中的天平上,五角大楼的指令要比中以关系重要得多!

笔者没有一点想贬低工党,证明利库德是“可爱”的左派的意思,只是想说明两党在原则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,只是利库德的表现不如工党圆滑、灵活,更能配合超级大国全球战略意图,如此而已。

对以色列政治的多年追踪,得出这样一个结论:在

以色列,工党更能动员全国民众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战争,它已经领导了四次对阿战争;而利库德更能说服全国民众接受与阿拉伯的和平。

## 沙龙的性格和处世哲学

人们在谈及沙龙执政后的对阿政策时,多强调国际和国内各种政治因素牵制的外因,而对沙龙的“性格和处世哲学”则心存疑虑。现记录沙龙二三事,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沙龙。

**军旅生涯。**沙龙是以色列军界少有的、不是凭借权势和党派背景,而是靠“赫赫战功”由士兵晋升为将军的。这样的军旅生涯难免带有传奇色彩,不足为凭。沙龙首先是一个狂热的大以色列主义者,仇视巴勒斯坦人,在他指挥和组织的多项“报复行动”中,曾不择手段地血腥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斗争;他又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激进犹太民族主义者,他敢做敢为、桀骜不驯的性格,使他在作战中具有不顾一切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战斗作风。为此,他付出了巨大代价,却始终没能当上总参谋长,获得他梦寐以求的以色列最高军衔——中将。沙龙的老上级摩西·达扬对沙龙曾有过这样的评价:“他的勇猛、大胆,敢于战斗的素质是值得赞扬和鼓励的。”达扬认为“制止跳跃的骏马要比踢着不愿上路的骡子好多了”。沙龙的战斗风格对以军的影响非常大。

**巴列夫防线。**1967年战争后,以总参谋长巴列夫为首的一批高级军官提出建立一道“不可逾越”的防线,以防御未来战争中埃军的进攻。这道防线被称为“巴列夫防线”。沙龙针锋相对,激烈反对巴列夫防线,甚至威胁退出现役。沙龙认为:1. 进攻是以色列军队之魂,进攻式的防御是最好的防御。他不相信这样一条防线能挡住埃军的进攻,“不可逾越”只是自欺欺人;2. 以色列国土狭小,资源有限。防线建成后,一线需要配备1000名战斗人员,二线支援阵地和流动装甲部队还需投入1500人,加上后勤人员,这个包袱对

以军来说太沉重了。但建立防线的想法反映了战后以军内迅速膨胀的“轻敌思想”和民众中“厌战求和情绪”。沙龙的反对声最终被淹没。然而事实是最无情的,几年后的十月战争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,以色列为巴列夫防线付出巨大代价。

**放弃西奈。**1997年贝京执政,萨达特看准利库德有能力、有胆识和埃及媾和,故作出和解姿态。据报道,在利库德高峰会议上,沙龙多次劝说贝京放弃西奈,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。沙龙认为:西奈是个包袱,以色列不如放弃它争取主动;如果需要,给他一个装甲师,他可在几天内夺回西奈。沙龙的主张遭到党内外外的激烈反对,贝京犹豫不决,未敢贸然行事。但在嗣后的戴维营会谈中,贝京权衡利弊,采纳了沙龙的主张,埃及和谈局面真正打开。

**登圣殿山。**去年9月沙龙采取了一个“愚不可及的挑衅行动”——登圣殿山,引发了巴勒斯坦人压抑已久的满腔怒火。“阿克萨起义”一直延续至今,沙龙登山无疑是“导火索”。但如果从以色列一方看沙龙的行动,又将是怎样?

当时正值美以巴戴维营会谈前夕,离9月13日巴勒斯坦宣布建国的日期越来越近。形势紧迫。克林顿任期将满,热切希望在白宫玫瑰园再次举行以巴签约仪式,为他两届总统画上圆满的句号,因此加大了压力。巴拉克已在耶城问题上作了两个前所未有的让步:耶城问题可在巴以谈判中讨论;耶城可以分割。美国还有了分割的具体腹案。然而谈判仍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卡壳,美国对巴以双方压力越来越大。特种兵出身的巴拉克虽是以色列获勋章最多的军人,但政治与军事不同,未经磨炼的军人作风在政治上成了急功近利,鲁莽行为,很多决定甚至连他的顾问都不知道。他说要从黎巴嫩撤军,几天内就撤完了;几天前说要提前大选,后来又反悔,改成提前总理选举;他说取消中以交易,就取消了,如此等等。沙龙心中清楚,以色列在谈判中所做的任何重大让步,公众必须要提前有个思想准备,准备不足或超出民众的承受能力,就会引起动乱。在美国强大压力下巴拉克还会作出什么让步,以色列人心中无数。谁能制止这辆有可能颠覆的飞驰列车?只有沙龙。他经过深思熟虑,采取了登圣殿山的这一非常举动,扳动了紧急制动闸。沙龙的“登山行动”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,后人自有评论,但此次总理选举,选民似乎认同了沙龙这一“愚不可及”的行动。

或许这就是沙龙的“性格和处世哲学”:为了他认定的国家利益,可以不择手段。这也是贝京和沙龙的前辈贾鲍廷斯基的名言:目的使手段神圣。

既然今天以色列选民选择了沙龙,如果他有悖民意,明天也可把他赶下台,就如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那样。▲



“登山行动”后人自有评论。

罪行。第三,无视亚洲成千上万在日本屠刀下的无辜牺牲者,说“日本也有 300 万同胞之死”,认为日本是惟一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。日本极右翼势力这种“加害者”变为“受害者”的论调,使许许多多的公众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一代,陷入对自己历史的模糊认识中。

法律是与极右翼势力斗争的有利手段,但它不是万能的,只有正确认识历史,反躬自省,才不致重蹈覆辙。

近两年来,由于极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和日益猖獗,反对极右翼势力的斗争就更加重要和艰巨。在这场斗争中,出现了值得重视的一些新问题。

首先,必须注意极右翼势力进一步合法化的倾向。对于极右翼势力的斗争,有没有法律法规作保障,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。在德国,任何为希特勒法西斯翻案、歌功颂德的言论和行动,都属违法。当然,法律也不是万能的。这不仅有一个是否“有法必依”的问题,而且西方的民主法制本身就有它的虚弱性一面,弄不好,还有可能被极右翼势力利用为自己进一步合法化的依据。比如,欧盟 14 国针对奥地利自由党上台对奥实施集体制裁,这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、符合欧盟法精神的正确举措,却因为奥地利自由党是经过“合法选举”上台的,就在欧盟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中引起了争论。

日本又是另一个样。日本极右翼分子正在推动修改和平宪法,并力图使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,1999 年,日本通过了“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”,和与日本法西斯政权难以割断联系的“国旗、国歌法案”,2000 年初东史郎败诉等等。日本的极右翼势力不仅不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和约束,反而受到法律的保护。可见在日本同极右翼势力斗争的艰难。

另一个问题是如何“正视历史”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,首先是政治关系。在曾经存在过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的国家之间,侵略一方首先正视历史、反省历史,是实现和解,建立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。例如,近代以来,德国曾三次入侵法国,战后,德国正视历史,反省历史,实现了法德和解。近代以来日本也曾三次侵略中国(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为瓜分中国和朝鲜在中朝进行的战争),时间之长,造成的损失和苦难之重,远非德国入侵法国可比。如今在日本,那些不愿正视历史的人却认为,历史问题已经“了结”,并且居然质问“反复提历史问题是何居心”,难道要永远“推行谢罪外交”吗?这种行为已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心态。恩格斯曾经说过,一个伟大的民族,“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”(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)。此话何等深刻啊!▲



□徐向群

以色列有种“怪”现象:左翼的工党更能动员全国民众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战争,它已经领导了四次中东战争;而被视为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却能说服全国民众接受与阿拉伯的和平,以阿的第一个和约就是利库德领导人导演的。

### “沙龙忧郁症”

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,世界媒体议论纷纷。近日,巴以冲突升级,以色列动用武装力量,人们更加忧心忡忡:中东和平进程凶多吉少。面对沙龙,周边阿拉伯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加沙和汉尤尼斯的瓦砾堆,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尸骨。这个“残忍的推土机”、“导演黎巴嫩战争的魔鬼”执掌以色列大权,中东和平进程势将逆转,至少是停步不前,甚至可能爆发战争。“沙龙忧郁症”开始弥漫。

这不由使我想起近 25 年前的情景:利库德集团战胜连续执政 29 年的工党,第一次成为执政党,利库德的梅纳赫姆·贝京取代了工党的拉宾。当时阿拉伯世界一片惊慌,贝京是鼎鼎大名的“恐怖”军事组织“伊尔贡”的头子、代尔亚幸大屠杀的刽子手。由他掌权意味着全面镇压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开始,意味着向阿拉伯世界开战。一时间“贝京恐惧症”沸沸扬扬。然而事实又如何呢?在贝京掌权的第三年,他以无可争辩的权威一举归还了相当以色列本土面积 3 倍的西奈半岛,换来埃及和约与正常邦交。埃及由此退出反以联盟,“没有埃及参加,就没有阿以战争”,中东政局发生根本变化。今天的“沙龙忧郁症”似乎大可不必,与贝京相比,沙龙的政治强硬度只是小巫见大巫。